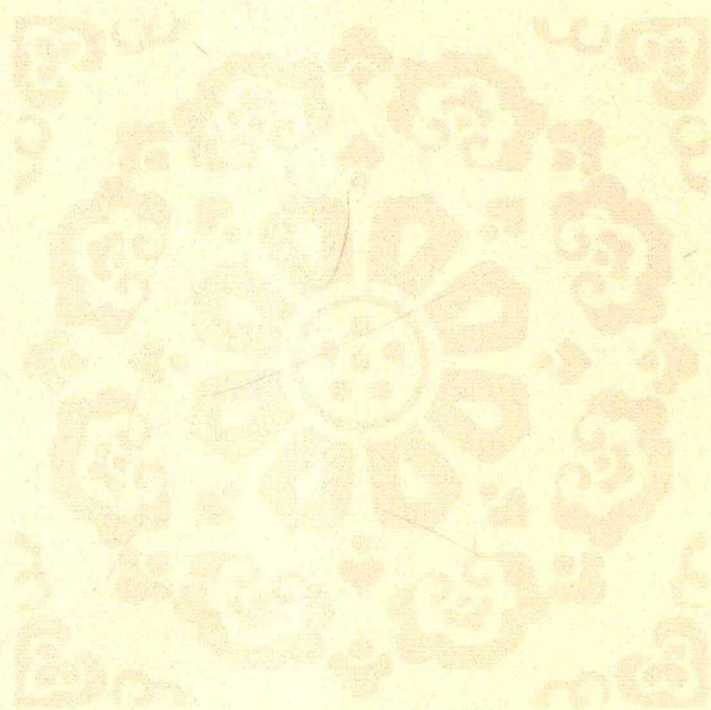


科举文学论

李子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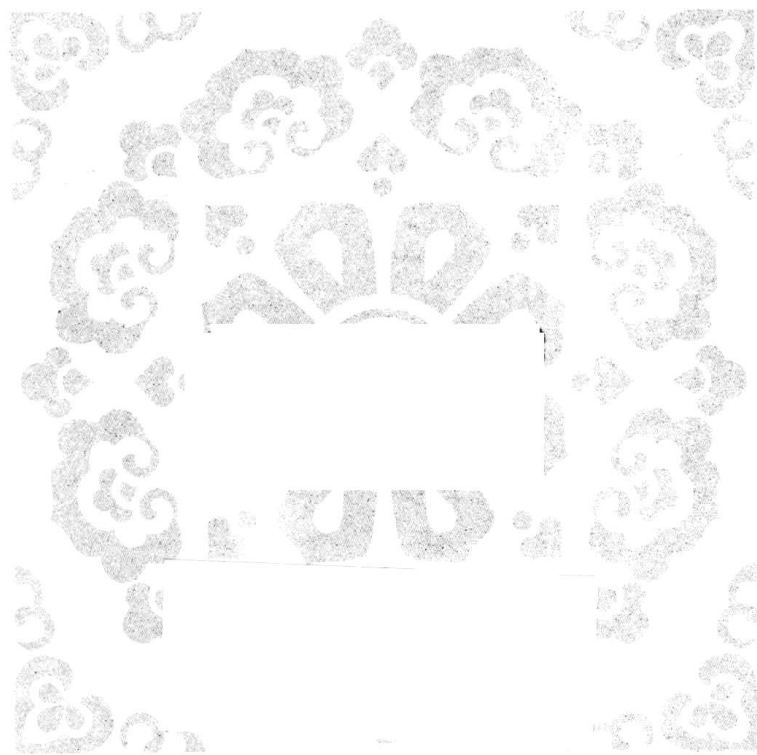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科举文学论

李子广/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举文学论 / 李子广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61 - 1200 - 7

I. ①科…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05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 儒家思想与文学考试	(1)
(一) 科举制的产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1)
(二) 科举考试与尚文传统	(4)
一 唐代科举文化与诗歌繁荣	(8)
(一) 唐代的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以诗赋取士,造成了 诗歌的普及,形成了朝野上下崇尚诗道、普遍学诗 的社会风气	(9)
(二) 唐代的科举取士,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走上文坛, 改变了贵族独霸文坛的局面,促进了唐风的形成, 并从而成就了以诗歌为精神生活最高形式的唐人 风范	(16)
(三) 科举也造成了文士的流动、交游与聚合,开拓了诗 人的视野,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促进了诗歌艺 术的发展	(20)
(四) 进士初任之官的低微,造成了唐代文人理想与现实 的矛盾,使唐代诗坛出现了别样的声音和色彩	(30)
二 唐代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	(34)
(一) 进士集团或阶层,构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勃兴的基础	(34)
(二) 进士科举以古文行卷与纳省卷风气的形成,为古文 运动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有利契机	(36)
(三) 韩柳相继以师道自任,导启来学,为古文运动的兴 起和展开建立起素质较高的作者队伍,并以此构成 文学集团	(39)

三	唐代科举与传奇小说创作的自觉	(45)
	(一) 由科举而形成的举人阶层遣兴娱乐和逞才延誉的需要， 既促使了传奇的兴盛，也导致了唐传奇小说对现实的 关注及唐文人好奇心理的形成	(46)
	(二) 由于科举及其行卷的关系，造成了唐传奇小说由重在 传述奇事向抒情言志的转变，“传”的样式兴起， 爱情题材流行	(50)
	(三) 在科举文化大背景下，唐传奇小说在艺术上充分文人化 而表现出高度的自觉	(57)
四	北宋嘉祐二年进士科举与文坛风云	(60)
	(一) 北宋嘉祐二年以前的文坛状况	(60)
	(二) 北宋嘉祐二年进士贡举的标志性意义	(66)
五	张九成及其状元策	(74)
	(一) 张九成的仕履学行	(74)
	(二) 张九成状元策的思想内容	(77)
	(三) 张九成状元策的艺术特色	(79)
六	《西厢记》与科举文化	(83)
	(一) 《西厢记》与科举文化的关联	(83)
	(二) 《西厢记》充分揭示了科举文化与世族文化的矛盾 冲突	(85)
七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91)
	(一) 宋代南戏以写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故事最为 引人注目	(92)
	(二) 元代南戏在士人婚恋主题上的两大转变	(97)
	(三) 小结：由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	(100)
八	明清科举文学概观	(102)
	(一) 以科举入仕为指归的文人教育与士林风习	(102)
	(二) 八股文化背景下的散文发展	(107)
	(三) 桐城文派与八股时文	(113)
	(四) 戏曲小说与科举的关联	(118)

九 《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人群像·····	(124)
(一) 才士困顿者的生死歌哭·····	(124)
(二) 迷恋科举功名者的种种变相·····	(126)
(三) 落魄士子的功名念与白日梦·····	(131)
(四) 对科举弊端成因的形象反思·····	(134)
十 《贾奉雉》的思想深度·····	(138)
(一) 传统士人品格与八股文化人格的两难选择·····	(138)
(二) 自我拯救的努力与精神逍遥的无奈·····	(143)
十一 《儒林外史》的科举文化批判·····	(148)
(一) 全景式地展示科场内外的各色士林人物, 充满 深情的冷漠与含泪的讽刺·····	(150)
(二) 作者以躐迹寻踪的笔法与独特的结构方式摹写 科举士人的纷纭面影, 揭示其失掉“故家”的 生命漂泊与生命样态·····	(158)
(三) 审视儒林, 真儒何在? 作者无奈地把目光投注 到儒林外的市井细民。在叙事的背后, 透出惘 然、苍凉的文化悲情·····	(167)
十二 优语讽谏中的科举考试·····	(174)
(一) 优语讽谏在对考官作弊、出题, 衡文疏漏, 王 安石变革科举等方面, 都有明确的揭示和反映·····	(174)
(二) 优语讽谏大多直面讽刺对象, 对事情的及时反 映, 表演方式的独特性, 都使其所表现的科举 情事在一定程度上“事件化”或“新闻化”, 并从而获得了广泛传播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应·····	(178)
(三) 优人戏儒戏圣而及于科举, 这一传统代表了民 间社会关注热点; 戏剧演出与科举盛典的关联, 也无疑加强了优人对科举考试的高度关注·····	(180)
十三 八股文破题佳话与蒙学语文教育·····	(183)
(一) 八股文破题佳话及其教育背景概观·····	(184)
(二) 八股文破题的蒙学语文教育功能·····	(189)

(三) 余论：应重视对八股文破题佳话的研究	(193)
十四 纪晓岚《赋得绮丽不足珍》的诗学解读价值	(194)
(一) 李白是否轻贱建安诗人	(195)
(二) 李白诗论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	(198)
(三) 纪氏诗学解读的方法论意义	(200)
(四) 余论：试帖诗的价值重估	(203)
参考文献	(204)
后记	(209)

引论 儒家思想与文学考试

科举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其做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時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而所谓科举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与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相关的观念、制度和物质形态的文化。”“狭义科举文化则专指与科举选士相关的观念形态的文化。”^① 但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所具备的儒学与文学的性质，使它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观念联系紧密；或者说，传统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科举制度。

（一）科举制的产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文官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儒家德化尚贤思想相关。汉代儒家思想的独尊导致与之相关的察举制“以德取人”的主导倾向以制度化的形式实现。这正如戴表元所说：“儒者之说，其精者为道德，其粗者为礼乐刑政。”（《大学中庸孝经诸书集解音释序》）所谓“其精者为道德”，大体指的是意识形态层面；而“其粗者为礼乐刑政”，大体指的是政治制度层面。两者相表里，构成了封建文化的整体。其中儒家德化尚贤的思想直接支配了那一时代的选官制度。在儒家那里，德化政治与贤能政治并举，这两种思想在《论语》中都可考见。《论语·为政》：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① 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载《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这段话说明只有用道德来治国理政才能如北极星一样为众星拱卫，即得到拥护。而这种德政的实现则有赖于选贤与能的选官新制。《论语·子路》载：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这段话即表明了孔子“举贤才”的思想。其意思是说：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向孔子问政治。孔子道：“给工作人员带头，不计较人家的小错误，提拔优秀人才。”仲弓道：“怎样去识别优秀人才把他们提拔出来呢？”孔子道：“提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吗？”（用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文）孔子的这一主张只是一种理想，在当时不可能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古代的一些儒家典籍如《礼记》也对选贤与能的理想进行过描述。

其《礼运》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选贤与能”是“天下为公”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打破了奴隶制的血缘世袭选官思想。这些思想可以说为汉代察举及后来科举制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儒家教育与入仕相结合的思想为科举制的形成确立了一种基本模式。

章太炎先生曾指出古代“学在官府”（参看《论诸子学》、《国故论衡·原儒》）的事实，说明当时的文化与政治都垄断在奴隶主贵族手中。或者说，学习和做官是一体化的。平民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也就意味着被剥夺了做官的权力。从训诂学角度看，“学”与“仕”在春秋以前或春秋初期是同一意思。《说文》：“仕，学也”；“宦，仕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释“宦”字云：“犹今试用学习之官也。”释“仕”为“学”，颇得古训之真相。《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见一饿汉，问他何以至此，他答曰：“宦三年矣。”服虔、杜预均释“宦”为“学”。由此可以推断，在春秋前或春秋时期，“仕”与“学”本为一事。这显然与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的状况有关。

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他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所谓“无类”，即不分尊卑贵贱之义。何晏《论语集解》注引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刘宝楠《正义》引《吕氏春秋·劝学》证明这种说法。《劝学》谓：“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自东汉以降至于清代，多数注家持此说法。再从《论语》中学生出身考察，足证此说确实成立。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云：“孔子以布衣，养徒三千，本其‘有教无类’之精神，自缙绅子弟以至狙佻大盗，皆‘归斯受之’。”孔子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庄子·天下》篇讲及儒家，即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六者正是儒家教人之六种功课。”^①

正因为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而私人讲学，且本着“有教无类”原则广招学生，实际上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和仕途的局面。但学生来源不一，品类不齐，因而子夏又强调“学而优则仕”：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

这实际上代表了孔子的意见，与其“举贤才”的思想相一致。“学而优”，强调了择优原则，只有优秀者才可入仕。这一原则显然是在“有教无类”、广招门徒的前提下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学而优则仕”这一提法虽然是从西周以来“学”与“仕”合一的制度脱化而来，但注入了与之不同的新内涵，即学习与入仕分成了两个不同阶段，只有优者才能入仕，加入了条件限制。准确地说，是学与仕的结合。这一原则直接为选贤不分门第而以才学为去取的科举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儒家思想为其理论基础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对文学产生了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8、72页。

极大的影响；它决定了文人的主导思想倾向及其读书、应举、入仕的既定人生道路。

（二）科举考试与尚文传统

科举考试，就其形式而言，主要是一种文学考试；举凡诗赋、策论、经义、八股，都是一种文学化的形式。这种现象，与中国文化悠久的尚文传统有关。

钱穆在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时，曾精辟地指出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就是“士的精神”（《民族与文化》）。他认为，中国的历史精神是有所寄托的，主要通过“士”这一阶层显示出来。士为四民之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领导中心，从而“士的精神”也就是中国历史的领导中心。从中西历史比较来看，这一特征为西方历史所无。西方人讲历史重视的是恺撒、成吉思汗等英雄人物，而中国人心目中最崇拜的却是“圣人”。中国也有秦皇、汉武一类大皇帝，但中国人并不尊崇这些人，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受尊崇的还是周公和孔孟。这是中国历史上人物造型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中国的士则由周公、孔、孟而形成。我们即由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可知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之所在。”（《民族与文化》）其影响意义在于，周公是一个政治家，孟子是教育家；孔子既是政治家，又是教育家。孔子和周公连在一起，便见政治意义重过教育；孔子和孟子连在一起，便见教育的意义重过政治。这就形成了中国所谓的“政教”。钱穆分析这一传统特点的成因时说，中国人看重政教，是因为地理环境与希腊不同，立国规模和罗马不同。中国由一个广大农村集成，大家有吃有穿，要使大家相安无事，而凝成一个社会，全赖政治。

由钱穆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士的精神”成为历史的领导精神，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尚文重教传统的形成。

中国人尚文重教传统的外在表现即极度崇尚文化礼仪。从“文”字看，其原始意义指的是“花样”。自然、社会莫不成“文”。由自然看，像红的绿的，拼起来就成为花样，这就叫文。由社会看，男的女的结为夫妇，这也是一番花样，这叫做人文。又如老人小孩前代后

代，结合在一起，成为父母子女，这也是一种花样，叫人文。社会就是由各种花样构成的。而从人文中化出来的就是“道”，夫妇之道，父子之道，修齐治平之道，所谓“人文化成”，即是儒家经典所要阐释的文化道德观念。^①而这一文化道德观念的得以实现是由“士”来承担的。他们在古代经典中寻找到了—种文化的传承系统，并认为只有持守这一价值系统，才可定国安邦。这种传统从周公、孔、孟一线传承下来，为士人所恪守尊奉，形成士的文化传统。这种“文”的传统表现在政治上，则特别强调“以文化之”。《说苑·指武篇》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把“文化”的作用看得如此之大，以文化之而反对武力征伐，或先文而后武。这就包含着一种“礼”在里面。因而可以说士人所传承的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礼文化”。有趣的是，在古代的战争中也表现出古人优雅的一面，“礼乐征伐”这个词即显示出“礼”的无所不在。黄仁宇先生曾言，“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②。

绍述先贤圣典，讲究礼仪道德，成为士的文化承担。这种文化承担必须依靠入仕来充分实现，而科举的以儒家思想和文学考试为主的方式，即适应了这一需求，使士人拥有了一种制度依托。

然而，这只是尚文重教的外在表现。从实质看，“礼文化”实际就是“唯语言文化”。这才是其内在特质。这不仅仅因为语言是传道的工具，而且语言这种东西在儒家看来是生命主体存在的前提，是天地之心的最高表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这实际包含着如海德格尔所说“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作为言说者的人是人”（《诗·语言·思》）的意思在里面。儒家重视言说，表现为对先哲经典的述说，更重要的是在述论中完成了自我价值与人格体验。《左传》

① 参看钱穆《民族与文化》，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7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72、73页。

② [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曾引孔子的话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由此重视语言表述及其对文学的尊崇成为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对此，李洁非先生曾在1992年11月11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历史性的尴尬——一个世纪末的文学》一文进行过较为精辟的阐述。他说：“当近代中国人从文学里看见‘反映生活本质’或‘阻碍社会进步’这类颇具魔力的作用时，他们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去表达公元3世纪魏文帝曹丕对文学的如下认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同样，曹丕也并非赋予文学以这种地位的第一人，他也不过是社会的文化语义系统自我复制出来的一个音符而已。这个语义系统经记载下来的第一个音符，应当是孔子；我们在古代典籍里可以找到孔子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不学诗，无以言’。然而，孔子远非这一文化语义系统的创始者，这位大成至圣先师诚实地表示，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述周礼’。周礼仍然不是源头，因为它自‘殷鉴’而来；而殷商之前有夏，夏之前有三皇……”

李洁非先生说他无法为这一文化语义系统确立一个起点，但可以将其命名为“礼文化”。“‘礼文化’的中枢，不在于生产、不在于军事、不在于金融、不在于货殖、更不在于科学，而是在于语言。它用语言制订道德规范、述载史事、传递上下之间的信息、教化群氓；因此，‘礼文化’贯彻最终决定于语言所显示出来的力量，那么，有助于完善语言的艺术——亦即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高尚尊贵的事业。”

在中国古代，凡是要走入官场的儒子都必须经过文学上的训练，“而他们未来的主要工作方式也正是文学的方式（写作奏疏；在公务之外，为文赋诗并不光是一种雅兴和消遣，不妨视之为士大夫们的‘课外作业’）。封建时代每一位新科状元，都是政治与文学的婚姻的产儿”。“从来没有其他社会曾给予文学（语言）以如此之大的崇拜，使之成为社会最高权力的一种象征；掌握较高语言能力的人，似乎就掌握了无形的权柄，似乎就是社会的栋梁。因此，从代代相袭的价值观念出发，中国每一个立志于文学的人都先天地使自己置身于如下的角色：天降大任于斯人焉。这种潜在的意识，一直是中国文人（作

家)的普遍意识,是他们举世无双的心理特征。”(同上引)

李洁非先生是在分析 20 世纪末文学面临转型的处境时,追溯以往的“文学”概念而对传统文学的独尊地位进行了解析。这种阐论道出了传统尚文观念的实质,并涉及科举制的一些内在动因。科举制是“唯语言文化”的产物;同时,它的产生与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这一文化现象的巩固与普遍化,并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一 唐代科举文化与诗歌繁荣

唐代诗歌创作云蒸霞蔚，可谓洋洋。唐诗与宋词、元曲各擅一代之胜，已成公论。对其所以繁荣之因，却颇多异议。其中唐代科举与诗歌兴盛之关系，即为其争议焦点之一。持正面观点者，自古及今，所在多有。古人之中，其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觴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殫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

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艺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

（《御制全唐诗序》）

以上所论，在唐科举以诗赋取士时间的判定上，虽较笼统，甚或有误，但都肯定了唐科举以诗赋取士对唐诗繁荣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反的意见，亦时见载籍。较著者有：

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试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

（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胡唐论诗》）

天生一种诗人，绝不为朝廷取士不取士所累。

（钱振鏞《谪星说诗》）

古人的这些争议，对我们深入思考科举与唐诗的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科举与以诗赋取士毕竟有所不同。前者范围较为宽泛，而后者则过于狭窄。古人主要集中于后者讨论问题，虽部分合于事实，却未免拘墟小样。我们认为，科举属于制度文化范畴，在这一制度下所造成的文人的地位、行为、心态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学创作。因而，从主要方面看，无论是科举，抑或是以诗赋取士，都对唐诗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不是相反。

（一）唐代的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以诗赋取士，造成了诗歌的普及，形成了朝野上下崇尚诗道、普遍学诗的社会风气

唐代以诗赋取士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说。现据有关史料及今人说法略作述考，以明其究竟。

《旧唐书》卷一六六：“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汉策贤良，隋加诗赋……”

《唐摭言》卷一“试杂文”条：“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应作‘第’）。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二篇，初无定名，唐书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金史》卷九五《移刺履传》记移刺履所言：“（唐）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八“进士科故实”条云：“唐进士初止试

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八《唐律类赋序》云：“稽唐科举之制……凡试必有诗，凡诗必用排律……至元和八年始专以诗赋取士……”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说高宗永隆二年始以杂文试进士，“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进士”条云：“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认为“诗赋并不该于杂文之内”，“刘思立请加杂文时，亦当并无诗赋”。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认为：“惟赵氏（指赵翼）所言，也颇有疏误，首先是误以为试杂文即系试诗、赋。”附注说：“和赵翼同样误以为试杂文即试诗、赋的，还有叶梦得……《唐音癸签》卷一《进士科故实》条及今人岑仲勉《隋唐史》卷下《唐史》第十八节《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所说亦同此误。”

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一文在回答梁超然、皇甫烜对《唐诗选·前言》有关进士以诗赋取士的驳难时（梁文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对史料进行考辨后，认为：“……高宗调露以后开始杂以诗赋取士的论点仍可成立，《前言》所引《唐会要》关于始于‘国初’的论载，作为约指，似无甚大错。弄清了这一点，就能较准确地表述以诗取士和唐诗繁荣的关系：它是初唐诗歌初步繁荣影响到科举制度的结果，又是盛唐诗歌高度繁荣的一个原因。”（载《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

傅璇琮《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认为，赵翼《陔余丛考》所言永隆二年因刘思立建言，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为进士试诗赋之始的说法有误：“说永隆二年起试杂文，即是试诗赋之始，实际上最初所谓杂文者只是箴表论赞等，后渐为赋或诗，杂文专试诗赋已是开元、天宝之际。”因此，作者认为徐松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见前引《登科记考》卷二）。“……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的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因此，那种片面地强调唐代进士以诗取士促进了诗